

国家意志、发展战略与市场制度的演进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轨迹及展望

刘庆岩, 孙 早

(西安交通大学 经济与金融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61)

摘 要:文章通过地区产业结构、地方政府行为及企业家创新意愿三个变量刻画了作为国家意志体现的经济发展战略在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分析了发展战略作用于地区经济发展绩效的传导渠道。分析表明,改革开放以来的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在某种程度上是通过国家动用东部市场化(新增部门)创造的财富持续补贴西部现行体制(存量部门)的方式取得的,最终引发了地区发展中的“体制补贴”矛盾。其政策含义是:新的发展战略应避免以牺牲(抑制)地区市场制度的演进为代价来换取西部快速发展,应在满足国家战略性需求与增强西部可持续发展潜力之间寻求一个恰当的平衡点。

关键词:产业结构;地方政府行为;企业家意愿;地区经济发展

中图分类号:F061.5;F06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952(2009)03-0091-11

一、引 言

人们通常习惯于将西部地区近 60 年的经济社会发展史划分为两个时间段来理解。1978 年之前的 30 年是以计划经济为主的时期,之后的 30 年则是中国经济社会大转型的 30 年。前 30 年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西部地区的发展得到了中央政府的有力支持;后 30 年的情况则要相对复杂一些。从 1978 年开始,伴随着国家经济的市场化转型,“效率优先”的原则逐渐为社会所接受,“让一部分地区先富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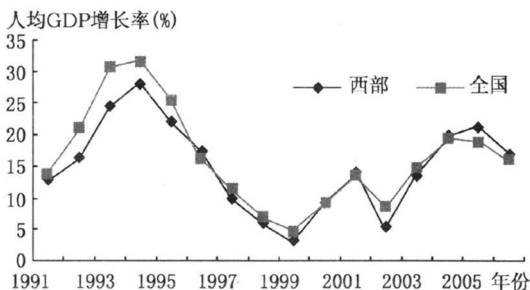


图 1 西部地区人均 GDP 增长率与全国平均水平的比较

资料来源:1999 年以前的数据来自《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1999 年以后的数据来自相应年份的《中国统计年鉴》。

收稿日期:2008-12-18

作者简介:刘庆岩:(1976—),女,河南南阳人,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博士生;

孙 早:(1966—),男,江苏泰兴人,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来”成为当时国家区域发展战略的指导思想。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地区差距持续扩大,直到 1999 年中央政府开始实施新一轮西部大开发战略后,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绩效才开始有了明显改观(见图 1)。可以认为,在中央政府的大开发战略带动下,西部地区再次步入了快速发展的轨道。

我们同时注意到,1999 年提出的新一轮西部发展战略具有两个重要特征:(1)是在全国市场化改革推向深入的关键时期启动的;(2)从内容和形式上判断,新的发展战略的制定和实施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带有 20 世纪 70 年代主流发展理论^①的思想烙印。作为一个理论逻辑延伸的结果,我们进一步看到:

一方面是整个国家经济的市场化转型,市场制度更有效率被视为基本前提假定;另一方面是新的西部发展战略却又从“市场不完善”的前提出发,在一定程度上以抑制地区市场制度的演进(见图 2)^②为代价来换取西部地区的高速增长。这一矛盾提醒我们,如果肯定市场制度发育水平决定地区经济发展绩效的假定,那么当东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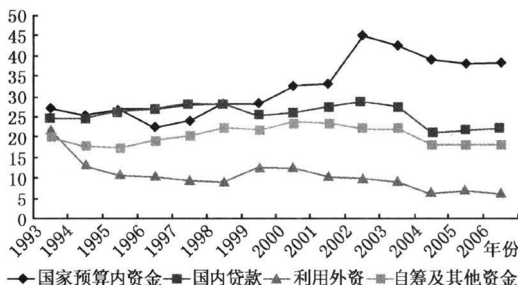


图 2 西部地区与全国固定资产投资资金来源比例关系

资料来源:根据相应年份《中国统计年鉴》数据整理得到。

地区率先建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时,需要被迫再次通过发动新一轮西部大开发运动来缩小东西差距的可能性就是客观存在的。从理论上厘清这一矛盾产生的深层次原因,以及可能(潜在)的不利影响,对于人们正确认识和把握改革开放以来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轨迹,展望西部未来的发展前景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正如我们一再强调的,西部地区发展的特殊性就在于其独特的自然环境、地理位置及民族问题(孙早, 2001)。这种特殊性决定了中央政府势必要在西部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落后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模式选择的多样性(格申克隆, 1960)。在这个意义上,只有将新时期的西部经济发展问题放到一个基于政治经济学分析的理论框架中,才能更准确地刻画国家意志、发展战略与市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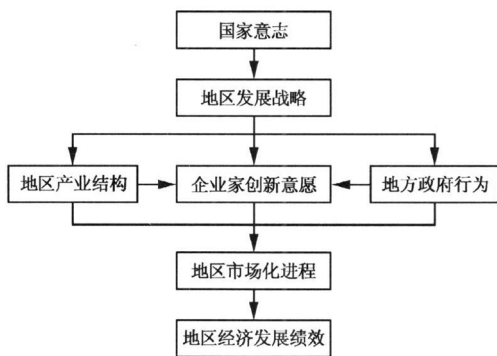


图 3 国家意志、发展战略对地区经济发展的决定

制度演进之间关系的本质特征,及其对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决定。图 3 提供了本文的大致分析思路:在市场化 and 全球化背景下,中央政府基于全局考虑的战略举措从宏观上决定了西部地区产业结构的变化趋势,塑造了西部地区地方政府的行为激励机制;在微观上影响到西部地区企业家的创新意愿,三条传导渠道的共同作用最终决定了西部地区的市场化进程,而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绩效则是内生于这个市场化进程。

二、发展战略、产业结构变迁与地区的市场化进程

(一)改革开放初期的西部产业结构变化趋势。始于 20 世纪 70 年代末期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因其所具有的渐进性和增量特征而有效避免了苏联和东欧改革所引发的长期经济衰退。国家在尽可能不触动原有资源存量的前提下,通过物质激励手段在传统体制外创造出新的增量资源,并按照市场规则将其配置于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以纠正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给国民经济结构造成的偏差,“三位一体”的经济体制随之被打破(林毅夫等,1995、1999)。因为早期的价格体制改革是从产品市场入手的,要素市场的开放严重滞后,新旧体制并行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利益上的差别。同一时期,中央向地方的放权促使地方政府成为独立的经济主体,价格双轨制造成的利益差别很快就反映在了地方政府对地区产业结构的选择上,优先发展具有高回报率的加工制造业成为各地方政府的理性行为。对于自然资源丰富、轻工业基础薄弱的西部地区也不例外,地方政府集中有限的财力、物力迅速建立起了大规模的加工制造业。他们的行事逻辑是:与其将资源以低廉的价格卖给东部地区,不如建立起属于自己的资源利用型企业,以提高本地区的就业率和收入水平(江小涓,1998)。与此同时,为了保护新兴工业的成长,西部地方政府还积极设置区域贸易壁垒来阻止本地区资源类产品的流出和其他地区竞争性产品的流入(Qian、Weingast,1996;Young,2000)。根据现实数据(数据图略)所反映的情况来看,与人们的直觉似乎有所不同,尽管深处中国内陆,又缺乏中央政府优惠政策的支持,但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西部地区产业结构的演变趋势始终呈现出较为明显的“轻型化”特征,与全国产业结构的平均水平基本趋同。例如 1987 年,西部地区采掘业和原材料工业的产值比重为 18.3%,仅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 0.4 个百分点,制造业的产值比重为 76.6%,仅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1.9 个百分点。可以断定的是,至少在改革开放的前期,在经济利益的刺激下,西部地方政府自主选择了制造业作为地区产业发展的主导方向,西部产业结构变迁并没有呈现出更多的地域特征。

(二)内生于西部发展战略的产业结构变迁及其对地区市场化进程的影响。后来的情况正如人们所目睹的那样,各省市对加工制造业的大规模重复建设最终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期引发了较为严重的通货膨胀和能源、原材料

供应危机。为了保证国民经济的平稳运行,尤其是为了缓解资源对东部高速增长地区的瓶颈制约,中央政府对自然资源储备丰富的西部地区的发展问题进行了新的战略部署,通过加大资金投入培育西部资源类工业的成长成为中央政府优先考虑的战略目标。对西部资源类工业的大规模持续性投资开始于 1996 年,这也正是中国完成轻纺工业“补课”并重新走上重工业化发展道路的年代。相应地,同一时期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开始明显表现出向资源类工业集中的趋势。到 1997 年,西部采掘业和原材料工业比 10 年前提高了 8 个百分点,高于同期全国平均水平 7.5 个百分点,而制造业则比 10 年前下降了 9.7 个百分点,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9 个百分点。这一变化趋势在 1997—2006 年新的 10 年间被进一步强化了。我们的基本判断是,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后,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变化方向与全国其他地区产业结构的总体演变趋势发生了较大程度的背离,并对全国资源类工业比重的提升和制造类工业比重的下降产生了强烈的带动作用。

众所周知,资源类工业的发展对资本和技术的要求远远超过了普通加工制造业,尤其是一些大型矿产资源的开发,通常具有投资规模大、建设周期长、技术水平高的特点,面对过高的进入门槛,只有实力雄厚的大型工业企业才能够胜任。另一方面,由于我国宪法规定,地下自然资源的所有权归属于国家,一直以来,国有企业在矿产资源的开发方面享有垄断权利。虽然从 90 年代中期开始,省和县级地方政府被允许将所辖区域内的中小型矿藏授予非国有企业经营,但很多关系到国家经济安全的大型矿产资源的开发和经营权依然牢牢掌握在国有企业手中(Zhang 等,2007)。也就是说,在西部资源类工业比重迅速提升的结构变迁过程中,大型国有工业企业始终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表 1 2007 年西部地区工业组织结构(%)

行业/指标	大型企业产值 /行业总产值	国有企业产值 /行业总产值	国有大型企业产值 /大型企业产值
采掘业和原材料工业	55.93	56.64	83.43
制造业	27.18	29.35	58.62

资料来源:根据国研网数据库资料整理得到。

表 1 数据反映了 2007 年西部地区采掘业和原材料工业,以及制造业的规模、所有权结构的大致情形。不难发现,西部采掘业和原材料工业中的大型企业和国有企业比重都高出制造业一倍左右。更为突出的是,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产值的 98.70%被国有企业控制,94.85%由大型国有企业创造。在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领域,国有企业占据了行业总产值的 80.24%,大型企业占据了 65.20%,并且也几乎全部都是国有企业。国家对区域战略布局的调整,使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因资源类工业比重的提高而具有明显的“重型化”倾向,同时这些产业中的工业企业也呈现出规模结构“大型化”和所有权结

构“国有化”的特征。改革初期,西部地区的大型工业企业比重和国有工业企业比重与全国平均水平非常接近,然而到了2006年,这两项指标已分别超过全国平均水平8.2个百分点和25.3个百分点。

在行业中处于垄断地位的大型国有企业,一方面作为隶属于国家的企业,开采国家所有的自然资源不需要向政府进行任何补偿,另一方面又负有义务按照政府规定的远低于市场的价格向社会提供资源产品。成本和价格计算的双重缺失使这些企业失去了传统意义上企业的本性,效率不高、官僚作风盛行成为企业内部普遍存在的问题。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大型国有企业具有强大的行政势力,不仅比其他企业更容易获得国家财政和银行贷款的扶持,还能够通过影响国家的产业政策来有效排挤潜在的进入者,以维持已有的垄断优势,在许多行业形成了“国不退、民难进”的局面。国家赋予各省和县级地方政府所辖区域内中小型矿产资源的开采许可权的初衷,就是为了将非国有资本引入资源生产领域,提高行业的生产效率,缓解日益紧张的能源短缺局面。但这一私有化过程却因缺乏透明度而导致了较为普遍的寻租行为(Zhang等,2007)。自然资源储备蕴含着大量的经济租,随着省际贸易条件的改善,租金收益也不断提高,这就给相关利益主体的共谋行为提供了激励(Mauro,1998; Auty,2001)。既得利益集团采取向当权者行贿的手段来排挤潜在的竞争对手,而当资源产品的价格迅速上升时,当权者也更有激励重新订立合同,分享租金增值带来的好处。在这种情况下,地方一级的法院通常因为行政上的非独立性而难以作出客观、公正的裁决,反而容易成为共谋成员的一方。邵帅和齐中英(2008)用西部地区的样本检验了“资源诅咒”假说,他们利用平均每万人国有单位职工中被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的职务犯罪人数来反映地方的腐败程度,结果发现该指标与能源开发强度正相关,说明西部大开发过程中,能源的大规模开发一定程度上滋生了地区腐败行为。与资源开采权密切联系的腐败行为降低了市场交易各方对合同约束能力和法院强制能力的预期,破坏了市场公平竞争的规则,导致经济领域中更大范围的腐败行为。产业结构变化所呈现出的“重型化”和“国有化”趋势,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权钱交易”的腐败行为,导致了人们对正在形成的市场体制的信心危机。更重要的是这种结构变化趋势大大强化了西部国有企业的力量,客观上起了巩固西部传统体制的作用。在满足国家的战略需求的前提下,西部的高速增长在某种意义上是通过国家用东部市场化(新增部门)创造的财富持续补贴西部现行体制(存量部门)的方式取得的,最终不可避免地引发了地区发展中的“体制补贴”矛盾。

三、发展战略、地方政府行为与地区的市场化进程

(一)西部地方政府的角色定位及其激励机制的成因。作为国家意志体现的发展战略在重塑西部产业结构的同时也改变了西部地方政府行为的激励方

向,推进市场化改革、提高经济绩效的目标逐渐让位于保证国防和能源产品的供应并维持地区稳定。国防和能源生产作为一种公共产品,因地区收益小于全社会收益而经常出现短缺。中央政府在借助政治考核的同时,还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给地方政府一定比例的经济补偿,鼓励西部地区提高国防和能源产品的供给水平。这种做法带来了类似于国有企业中的预算软约束问题。正如 Bird 和 Smart(2002)所指出的,“只要地方政府花的是他们自己和本地民众认定的别人的钱时,他们就不会在这些钱的有效使用上受到来自于地方上的压力”。因西部在国防和能源战略中所占有的重要地位使得中央政府无法仅凭经济指标来考核西部地方政府的努力程度,相反,西部地方政府却经常以承担了较多的社会责任为由向中央索取更多的财政补贴。

Raiser(1998)沿用了 Ma(1994)的方法,用地方政府财政收支差额来衡量转移支付的规模,通过中国省际的对比分析发现,尽管财政分权改革导致了转移支付总体水平的下降,但是在西部地区,尤其是青海、宁夏、新疆和内蒙古等省区的地方政府仍然强烈地依赖于转移支付制度。而这些补助的最大接收者几乎全部从事于某种形式的能源生产,或是存在有大量的国有亏损企业。Raiser 还发现,由于 60% 以上的转移支付被用于重新配置投资资源,西部等内陆地区的投资率明显高于沿海地区,但这种较高的投资率并没有对地区经济增长产生正效应。Raiser 的解释是,转移支付通过降低全要素生产率(TFP)而削弱了地区经济长期增长的潜力。由于受到数据的限制,Raiser 的研究总体上还比较粗糙,因为在中国,转移支付资金的分配并不完全依据地方政府的财政收支缺口,富裕地区也可能获得高额的转移支付。相比之下,Shah 和 Shen(2006)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 Raiser 的不足。基于实际发生的转移支付数额,他们发现,中国各省人均转移支付的规模与各省人均 GDP 和人均财政收入呈不显著负相关,与各省人均财政支出和失业率呈不显著正相关。这一发现并没有为 Kornai(1980)关于过分依赖于补助会降低一个地区的投资效率和改革努力的论断提供一个强有力的经验证据。问题的关键在于转移支付的构成及其用途。同样是由于数据收集方面的困难,我们无法清晰展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转移支付细分项目在各地区的分配情况。幸运的是,Shah 和 Shen 的努力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线索。表 2 给出了 2004 年人均获得中央财政转移支付最多的省份及其各项目的具体数额。作为当年人均 GDP 水平最高的省级单位,上海同样也获得了最多的人均转移支付,观察其细分项目不难发现,其中的 56% 来自于中央与地方的分享收入,42% 来自于中央给地方的税收返还,可以说上海所能获得的转移支付规模与其自身的发展水平密切相关,地方经济的繁荣意味着地方政府拥有更多的财政资源。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2004 年人均 GDP 水平仅为上海 18% 的西藏自治区获得了最多的一般性补助和专项转移支付,而这两项支付的主要目的是用于

平衡各地区的财政能力差距以及实现中央政府的某些战略安排。这才是 Kornai 意义上的“补助”。循着 Kornai 的思路,这种补助的增加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地方政府进行市场化改革的激励。

表 2 2004 年人均获得中央转移支付最多的省份及数额^③(元/人)

项目	收入分享	税收返还	一般性补助	专项转移支付	转移支付总额
省份	上海	上海	西藏	西藏	上海
数额	2 830	2 123	705	1 657	5 079

资料来源:本表中的数据来自于 Shah(2006)。

(二)西部地方政府行为对地区市场化进程的影响。中央有关地方转移支付的考量,以及对西部国防和能源工业的强化控制充分反映了中央政府在新一轮西部开发中的战略意图。在领会了中央政府的战略意图后,西部地方政府自然会将发展国防和能源工业,以及维持地区稳定作为优先追求的目标。围绕国家在西部地区设立的大型重点工业项目建立起相关的配套产业,不但迎合了中央的意图,获得更多的政策性补助,还能够分享到国家大规模投资国防和能源工业带来的正溢出效应,在短期内显著拉动地区经济增长。基于这种考虑,西部地方政府自然不太可能像他们的东部伙伴那样对发展非国有经济充满热情,不仅缺乏为非国有企业生产经营提供必要的公共服务、帮助企业进行市场制度创新的积极性,相反,还会通过增加非国有企业的体制外和非正规收费来弥补政府的财政缺口。在维持地方国有企业运转和建设出支的财政压力下,西部地方政府会倾向于借助行政权力影响银行等金融机构的信贷资金流向。Raiser(1998)分两个阶段考察了财政分权对中国省际资本净流动的影响,结果发现,虽然与经济发展水平相比,转移支付的比例总体上呈下降趋势,但是具有政治意图的地区间再分配对资本流动的作用不是减弱而是增强了。一个可能的解释就是,银行体系的政策性贷款强化了这个由转移支付建立起来的再分配模式。地方政府的干预行为扭曲了金融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不但降低了资金的使用效率,而且恶化了西部地区非国有企业的融资环境。

一般认为,中国经济转型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政府从经济活动领域的逐步退出。与中国其他地区相比,西部地区特殊的战略地位必然要求地方政府具有较强的经济活动参与能力,这在客观上减弱了改革西部现行体制的紧迫性。中央政府对西部的支持是服从于国家发展的总体战略目标的,但在局部上,诸如财政转移支付之类的制度安排的支持西部发展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了西部地方政府的行为激励,放慢了改革传统体制的步伐。

四、发展战略、企业家创新精神与地区的市场化进程

(一)西部地区企业家的创新意愿及其面临的约束。马克思(1880)、韦伯(2006)及 Baumol(1990)都强调了企业家及其创新精神在创建市场制度和创造国家财富的过程中所扮演的关键角色。企业家创新精神及行为通常被视为

一国或地区市场发育水平和经济发展的“晴雨表”。在这里,我们很难理解的是西部开发在带来西部高速增长的同时,却为何没能开创一个企业家的新时代。已有研究根据企业家的定义,大多采用某个时期自我雇用人数和新创立企业个数来衡量一个社会的企业家创新精神,Gartner 和 Shane(1995)则建议使用“人均拥有组织数”这一更具综合性也更易获得的测量指标。在图 5 中,我们用每万人拥有非国有工业企业个数来代表企业家的活动水平。很明显,虽然全国都处于上升趋势,但西部企业家的活动水平始终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并且差距仍处于不断扩大之中。西部大开发似乎并没有如人们所预期的那样广泛激发起企业家的创业热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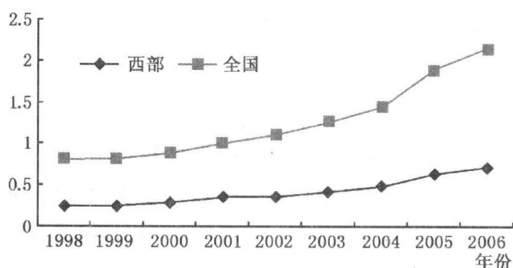


图 5 西部地区企业家活动水平
与全国平均水平的比较

资料来源:根据相应年份《中国统计年鉴》数据整理得到。

自熊彼特(1997)以来,企业家创新精神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备受关注。钱德勒(1987)和彭罗斯(2007)对美国大企业史的研究充分强调了企业家捕捉市场机会的能力对企业成长以及经济扩张的重要意义。一国或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起落往往被归结为企业家精神的兴衰。我们倾向于 Baumol(1990)的观点,即将无法解释的生产性问题归结为“企业家精神”的兴衰没有任何意义,因为一旦某个经济体被认为缺乏企业家精神,决策者将无所作为。重要的是,应该通过改变社会所盛行的报酬结构来激励企业家沿着生产性方向使用其才能。Dutz 等(2000)分析了企业家在不同行业和地区间的分布,发现发展中经济和转型经济体尤其需要注重两方面的因素,即保证生产性创新的回报以及培育草根企业家的创新机会,只有在能充分保证这些条件的地方,生产性企业家才会大量涌现。沿着这一思路,我们将影响企业家精神及创新行为的因素归结为“市场机会”、“经营环境”和“收益保障”三个方面,即市场中是否存在潜在的盈利机会,企业家能否借助外界条件把握这些机会,以及企业家自身能够保留盈利的多大份额。McMillan 和 Woodruff(2002)坚持认为,转型经济中并不缺乏市场机会,从计划体制继承下来的经济不均衡给企业家创造了巨大的利润空间和良好的创业机会。在我们看来,与东部相比,西部地区保留了更多旧体制的特征,因此不均衡的情况也更加严重。至少在理论上,随着中央政府西部开发战略的实施,西部地区应该蕴藏着巨大的商机并吸引更多企业家的关注。但在现实中,非国有企业的进入情况却并不乐观,草根企业家作为一个阶层在西部发展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无足轻重。

作为国家意志体现的发展战略从产业结构和地方政府行为两个方面塑造

了西部企业家创新活动的宏观环境,决定了企业家所面临的“市场机会”、“经营环境”和“收益保障”的特征。居高不下的大型国有企业比重与其说提高了非国有企业进入的经济壁垒,不如说提高了进入的管制壁垒更为恰当。缺乏自生能力的国有企业为了摆脱潜在进入者的竞争威胁,不惜动用行政资源对非国有企业在取得商业投入和资格认定等方面的活动设置障碍。这是促使潜在的生产性企业家留在非企业家职位或者追求其他生产性较小的企业家活动的一个关键因素(Dutz,等 2000)。不具有市场势力的新兴企业很难像大型国有企业那样在行政和金融服务,以及向关联行业进入的行动中得到地方政府的积极配合和帮助,再加上缺少必要的信息交流和咨询平台,非国有企业为了通过各项行政审批、了解交易对方的资信条件、监督合同的履行情况需要花费大量成本。更严重的是,西部地方政府经常会向非国有企业伸出“攫取之手”来缓解面临的财政压力。为了保证财产安全和契约的履行,非国有企业作出的理性反应就是将本应用于生产的资源转而用于与地方政府建立良好的日常关系。孙早和刘靠柱(2005)一项基于陕西和浙江民营企业调查问卷的研究发现,在与地方政府部门打交道方面,大多数陕西企业表示需要花费“很大”或“较大”的时间和财力,当与政府发生纠纷时,愿意上诉法院的企业比例仅为浙江的 1/5,并且有更多的企业认为政府对法院判决结果的“影响很大”。市场进入困难、经营成本居高不下、对未来收益缺乏稳定预期,这些因素使得西部大开发对企业家们的吸引力大打折扣。正如我们在现实中所观察到那样,西部大量拥有熟练技能且富有创业精神的年轻人不断迁移到东部沿海地区寻求创业的机会。

(二)企业家创新活动对西部地区市场化进程的影响。在特殊的宏观环境制约下,西部地区企业家的创新活动呈现出低水平和非生产性两个特征,并不同程度地抑制了西部地区市场制度的演进。

中国经济转型取得初步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新兴中小企业的大规模进入。这些新兴的非国有企业在地方政府的帮助下,克服正式制度缺失带来的困难,突破中央政府的管制壁垒,迅速成长为经济改革的主要推动力量(Blanchard、Shleifer, 2001; McMillan、Woodruff, 2002)。随着自身实力不断增强,非国有企业开始要求私有产权被平等地对待和保护,频频挑战国有企业的垄断地位,促进金融和其他领域的体制改革,在整体上推动了市场经济制度的建立(樊纲、陈瑜, 2005)。需要引起注意的是,地方政府对民间企业扶持的力度会因各地方政府财政激励的不同而在地区之间存在差异。东部地区的企业家在地方政府的支持下,借助非正式制度逐步成长起来,成为地区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一个重要阶层,并通过对正式制度提出新的要求而推动东部地区的市场化进程。与此同时,西部地区的企业家却仍是一支带有明显过渡性特征的弱小群体,他们对不良市场环境的理性反应反过来进一步强化了政府对经济发展的治理权,西部地区市场制度的演进也因此失去了来自民间的动力。

Baumol(1990)认为,凡是创新活动都是企业家精神的体现,企业家不仅会从事生产性活动,也可能从事非生产性活动。为了突破市场中的管制壁垒、规避地方政府的掠夺行为,西部地区的企业家需要具有更强的“政治创新能力”,与地方政府官员建立良好的私人关系成为企业经营成功的重要因素,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对“一般企业家创新能力”的要求。企业家创新才能使用方向的改变,意味着西部地区的企业家激励机制出现了严重扭曲,十分不利于“体制补贴”矛盾的解决。

五、小 结

本文发展了一个有关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通过产业结构、地方政府行为和企业意愿三个变量刻画了作为国家意志体现的经济发展战略在地区经济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初步分析了经济发展战略作用于经济发展绩效的传导渠道,并在此基础上指出了现行的西部发展战略可能存在的潜在风险(不利影响)。本文的主要结论及政策含义是:

(1)首先需要从理论上正确把握西部地区发展的“特殊性”和“一般性”之间的关系。特殊性源于西部独特的自然、地理及民族问题,这也是国家意志的最直接体现。一般性则是指不能脱离整个国家经济市场化转型的大背景。从经济发展的历史看,如何处理二者之间的关系,最终将会对西部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2)政府的介入不应以牺牲西部地区的市场制度演化进程为代价,需要从根本上摆脱传统的主流发展理论的思维定式。

(3)放眼未来 30 年,新的西部发展战略应以可持续性为主要特征,重点内容应是西部地区的社会主义市场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新的发展战略应在满足国家战略安全需求与增强西部可持续发展潜力之间寻求一个恰当的平衡点。

注释:

①流行于 20 世纪 50—70 年代的主流发展理论,如罗森斯坦—罗丹的“工业化大推进”理论、纳克斯的“贫困恶性循环”理论等,均强调了落后国家(地区)由于市场制度发育水平低,单纯依靠市场力量将难以走出低速发展的陷阱,政府干预(如制定好的发展战略并努力贯彻之)才是决定性的力量。但后来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实践证明,试图通过政府替代市场的方式来实现工业化的努力最终只能使经济陷入重重困境。

②在一般意义上,市场制度的主要含义是“市场在配置资源时发挥基础性作用”。除去法律制度方面的内容外,市场制度演进的标志包括:产业结构能够按照“比较优势的原则”决定;地方政府的行为激励是“亲市场的”;企业家的创新意愿能够得到鼓励。

参考文献:

[1]张培刚.发展经济学教程[M].北京:经济出版社,2001.

[2]孙早.西部发展中的政府意志与市场制度演进[J].战略与管理,2001,(6):12—20.

- [3]林毅夫,蔡昉,李周.为什么中国经济改革取得了成功:对其他改革中经济的含义[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95,(4):28—36.
- [4]林毅夫,蔡昉,李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 [5]范剑勇,朱国林.中国地区差距演变及其结构分解[J].管理世界,2002,(7):37—44.
- [6]江小涓.市场化进程中的低效率竞争——以棉纺织业为例[J].经济研究,1998,(3):40—49.
- [7]邵帅,齐中英.西部地区的能源开发与经济增长[J].经济研究,2008,(4):147—160.
- [8]马克斯·韦伯.经济通史[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6.
- [9]伊迪丝·彭罗斯.企业成长理论[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 [10]陈玉宇,黄国华.中国地区增长不平衡与所有制改革[J].经济科学,2006,(1):5—19.
- [11]孙早,刘靠柱.声誉约束、国家强制与企业的交易行为[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5,(4):37—45.
- [12]樊纲,陈瑜.“过渡性杂种”:中国乡镇企业的发展及制度转型[J].经济学(季刊),2005,4(4):937—952.
- [13]Young A. The Razor's Edge: Distortions and incremental reform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2000,115(4):1091—1135.

State Will, Developing Strategy and Evolution of Market Institution: Economic Development Path and Its Outlook of Western Region in China since Reform and Opening-up

LIU Qing-yan, SUN Zao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Xi'an 710061,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regional industrial structure, local-government behaviours and entrepreneur's innovation will, the paper portrays the role of economic developing strategy on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western region. It also analyzes the effect of developing strategy on regional economic performance. The results show that to some certain degree,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western region since reform and opening-up is achieved by the constant subsidies from the wealth created by marketization in eastern region, which introduces the system-subsidizing conflict. The paper provides policy implication that new development strategy should avoid promoting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western region at the cost of the evolution of regional market institution. And the governments should strike a balance between state strategic need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western region.

Key words: industrial structure; behavior of local governments; entrepreneur's will;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责任编辑 许 柏)